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平等问题探析

徐 珍

摘 要 平等要求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然而,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内存着各种形式的平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平等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它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构成方面。有效化解和克服这一矛盾有利于从整体上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消除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二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消除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消除行业或产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特别是消除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的加剧;四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人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

关键词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平等问题;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6-003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YJC71009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7M62066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作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也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平等问题,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高度重视、深入探析和认真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平等问题,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and 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平等要求: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平等就是贯穿这一系列日益广泛的需要和要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

平等要求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既是由平等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使然。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P248)平等是公平的客观基础和基本内容,也是正义的要求和体现。显然,平等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它寄寓着人们对一种美好社会状态、社会关系的共同期许。也正因如此,平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人们建构理想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

在西方思想史上,虽然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仅表达了一种有限的男女平等思想,但近代以降,从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里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都莫不把人人平等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价值尺度。如果说上述这些思想家们构想的理想社会及其平等追求还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平等构想则在他们为之奠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实践。霍布斯认为,“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3](P92),因此,人们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生命权、自卫权以及对一切事物的权利。洛克指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对其自然的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4](P34)。卢梭则认为,在原始自然状态下,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不平等几乎是观察不到的,并且它的影响力几乎为零”^[5](P109)。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特别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人类社会遂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并产生了种种不平等。在卢梭向往的新的社会,“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以致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6](P155)。经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上述思想家们追求的平等逐渐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人权。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发布之后,现代世界各国的宪法都对平等权作了具体的规定。美国学者阿德勒指出,平等是西方思想中与真、善、美、自由、正义并列的六大观念之一,是“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生存的世界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观念”^[7](P1)。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平等的追寻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早在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曾这样那样地表达了各自平等的价值诉求。孔子明确反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阐述了“均”的重要性:“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8](P245)孔子也很重视教育平等,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人们不论出身贵贱都应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老子也反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贫富不均,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9](P346)墨子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利理论,其所谓的“兼爱”,就是“在天下公义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赋予了每个人同等的爱和被爱的机会。它不以亲情损害正义,也不因与生俱来的身份限制人未来的发展”^[10](P203)。墨子还提出了不论贵贱、唯才是举的尚贤平等思想。先秦时期的这些平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老子主张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源头,历代农民起义也都莫不以“均贫富”作为自己的旗帜和口号。明清时期,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古代的平等思想。例如,李贽认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11](P99),主张人无贵贱、“圣与众平等”,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王夫之主张“均天下”,提出了人们生而拥有土地的平等思想。唐甄认为,“天地之道故平”^[12](P249),如果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整个天下就会倾覆。后在西方近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更是有了自觉的平等理想追求。这突出体现在康有为对人类“大同”世界的向往上。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描述了一个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人皆平等”的“太平之世”^[13](P3)。

平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的虚假性,分析和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平等掩盖下的种种不平等。他们指出,“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14](P195),“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14](P204)。

然而,要真正实现平等,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消灭阶级,“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15](P26)。而这一点,只有在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要向他们表明,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6] (P482)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平等的根源在经济领域,它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5] (P18),社会主义社会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因为在这里,“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15] (P19),但劳动者能力及家庭情况的差异必然会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

尽管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像共产主义那样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平等,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即剥削阶级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逐步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也以共产主义为其理想追求,其目标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真正的、完全的平等。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 余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另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平等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这种平等要求的满足已经成为新时代人们所期盼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新时代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说平等要求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可以说,这既关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渴望过上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梦想。

二、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

平等要求之凸显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现象比较广泛地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成为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 新时代我国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但绝不是说以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平衡的。实际上,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结果,是 40 余年的不平衡发展的集中显现,其中内含着种种不平等。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这种二元结构体制中,国家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且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支持城市大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实行了强制性的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不断地把农业剩余资本转化为工业积累;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国家还在城乡实行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把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事业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各种行政性资源几乎全都投向了城市,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极其有限,农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弊端日渐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改变的效果有限,结果是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城乡发展不平衡内含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最为引人注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1.5 倍,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超过这一数字,2012、2013 年甚至达到 3 倍以上,此后虽略有回落,但仍一直处于 2.7 倍左右的高位上。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曾说:“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最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首先是在城乡之间。”^[17] (P803)

除经济不平等以外,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经济不平等影响,城乡居民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例如,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干力量,但是,不仅农民工的工资偏低,而且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近 3 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却不能在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新时代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尤其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也为了充分发挥东南沿海地区在地域、人才、资金方面的优势,国家实行了有利于东南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并进行了相应的资源配置,有效地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也由此逐渐拉开了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使二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越来越凸显。2018 年,人均 GDP 排在前十一位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内蒙古、湖北、重庆均超过 1 万美元,它们中绝大多数都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而排在后六位的山西、黑龙江、西藏、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均低于 7 千美元,它们中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排在末位的甘肃只有 4735 美元。同时,我国不同区域内部更小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较为严重。例如,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成渝地区重庆、成都与周边城乡之间,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深圳与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等等,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差距。这类区域发展不平衡内含的不平等也是非常明显的。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 元,有 10 个省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只有排列第十位的内蒙古属于西部地区,而新疆、广西、青海、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 7 个西部省份排名最后七位,排名末位的西藏为 17286 元,仅相当于排名首位的上海的 37%,换句话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藏的 2.67 倍。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还表现在与 GDP 密切相关的地方财政能力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享用上。人均 GDP 是与地方财政收入及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密切相关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按照统一的财政投资比例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社保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及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必然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断累积,结果就是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是不同行业或产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为不同行业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类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 20 余年来,我国的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业发展过快,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11-2016 年,我国实体经济占 GDP 比例由 71.5% 下降到了 64.7%;而同一时期,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则逐年增加,至 2016 年达到 8.4%,这一比值甚至超过美、日、英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虽有所下降,但 2018 年仍运行在 7.68% 的高位上。金融业增加值的 GDP 占比过高,意味着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以 2016 年为例,当年我国企业五百强中制造业企业共有 245 家,占总数的 49%,但这 245 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仅仅相当于两家最赚钱的银行创造的利润。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实质是整个经济脱实向虚,“大量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信贷资金、民间融资都涌向了房地产行业,金融机构表外融资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大量社会资本不但进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存量资本也被抽血进入金融体系牟利”^[18],它不仅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内含着较为严重的不平等,特别是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1978-2018 年期间,在我国所有行业中,金融行业的平均工资曾长期居于最高水平,仅在近两年才被 IT 行业略为超过。2018 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额达 129837 元,

比居第三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额高出 6000 多元,是各行业平均工资的 1.57 倍。更为重要的是,近 20 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亿万富翁。早在 2013 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 年全球富豪榜》就宣告,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 10 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中国财富正在飞速增加并向富人集中。当时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表示,中国每 100 家公司上市就会造就超过 50 个 20 亿元级别的百富榜富豪,而房地产行业成为富豪们发家致富的最佳途径^[19]。此外,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和不规范的情况下,人们炒股、炒房往往也能获得丰厚的收益,一夜暴富的情形也不在少数。与之相比,实体经济领域的从业者、特别是一般企业的普遍员工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收入。总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含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非常明显的。

(二) 新时代我国不充分发展对不平等的加剧

上述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又因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充分发展而被迫加剧了。这里所谓的不充分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比较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的,它并不是指没有发展或仅仅是低度发展,而是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水平。这样一种不充分发展,也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它使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变得更加复杂。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根源于发展不充分,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又凸显了发展不平衡内含的不平等。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发展不充分。例如,导致我国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最重要的具体原因之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但我国之所以长期实行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只能把有限的行政性资源集中于推进城市的工业化。再如,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最重要的具体原因是国家实行了有利于东南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资源配置,国家之所以难以对所有地域进行均衡的资源配置,仍然在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用于推进发展的资源有限。作为区域不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同区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还严重不足。正是由于发展不充分,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内含的不平等变得异常突出。例如,在 2019 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中国有 437 位富豪上榜,其财富总和为 13025 亿美元,其中财富达 12 亿美元者有 299 人,而美国有 500 位富豪上榜,他们的财富均达 12 亿美元以上,财富总和为 31329 亿美元^[20]。就此而言,美国富豪远比中国富豪更加富有。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尚有 1660 万贫困人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 3535 元,因此,中国社会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更加凸显。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也实际地加大了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过程中社会财富的增加为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一般来说,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会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限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实行的是极端平均主义原则,社会成员处于普遍贫穷状态,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正如上述,我们说的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并不是指没有发展或低速发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历了 40 余年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呈数十倍地增加,人们早已摆脱了那种普遍贫穷的状态。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成就是在破除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它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很有可能导致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关政策未及时调整、有关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失误和问题已使得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现实。本来,正如罗尔斯

所说,每个人的出身、天资、运气各不相同,“即使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生前景也深受社会偶然性、自然偶然性和幸运偶然性的影响”^[21](P89),从而必然会出现贫富差距。更何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政策导向和体制性因素,都在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在出身、天资、运气方面的差异,扩大着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例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导向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迟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虚拟经济的监管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等等,本身就是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的表现,而它们又在不断地加剧着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反映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一直位于0.45-0.48之间,远超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再次,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还加剧了人们在机会、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上述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本身也会强化人们在机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拥有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所能获得的机会和所能享有的权利必然是很不相同的。除此之外,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人们在机会、权利方面的不平等的加剧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就对机会不平等的加剧而言,最典型的表现是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中存在的阶层固化效应,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代际传承性加强。社会学家们认为,在发达的良序社会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开放的,每个人都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和自身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即使是贫民也有进入精英阶层的上升通道;也只有如此,整个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充分发展,许多社会资源被精英阶层垄断并直接间接地传递给了后代,从而出现了全社会极为关注的“拼爹”和“二代”现象,如“富二代”“贫二代”“蚁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教育、就业、升迁等各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就通过代际传承而被持续不断地放大着。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阶层固化效应。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权利不平等的加剧,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特权问题上。所谓特权,就是某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得到的特殊权利,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权力腐败。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实际上是官员在制度的“笼子”外大搞特权的结果,它严重侵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是权利不平等的集中体现。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固然与官员个人的道德修行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关制度不完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完善,是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的重要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直接导致权力腐败的特权问题的存在突出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权利不平等的加剧。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平等问题的克服途径

上述表明,一方面,平等要求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内存着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平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就在于此。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它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构成方面。

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的产生,与新时代我国的基本国情密切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这样一种基本国情,使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具有独特的规定性。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这一矛盾并非新时代我国社会本身永恒固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P109)。按照邓小平的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观,社会主义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因此,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谬,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我国社会本身固有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任务,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

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内存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也终将被克服,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在我国社会永恒地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这一矛盾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在文化上表现为科技发展水平和国民文化素质还不够高。也正是根据我国社会的这些特征,邓小平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不过,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具有不同的具体特点。例如,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社会成员在经济上倒是相当平等的,即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和增长,在破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同时,不仅真正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而且还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出现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配不均之间存在着U形曲线关系”“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然后到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23](P340-341)。经济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带来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不平等。所有这些不平等的累积性发展,最后造成了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

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本身永恒固有的,但又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听之任之。恰恰相反,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这一矛盾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因为,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平等要求主要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但它对物质生活需要和其他精神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在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的我国社会,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在经济平等、社会成员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人们一般不会产生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要具备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往往就会感到很满足;而在经济不平等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对那些比较贫穷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他们的满足感、获得感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仇富”心理和对社会的怨恨。这就是说,如果人们的平等要求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适当满足,即使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其他方面获得了较高级别的满足,人们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从而会从不同方面和以各种不同的复杂方式加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因此,要从整体上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克服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

化解和克服新时代人民的平等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入手。

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消除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消除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关键在于改变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格局,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新时代我国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努力破除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使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彻底改变城乡二元

社会结构体制;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针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帮扶,尤其是注重在深度贫困地区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确保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4]。到那时,我国将实现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并将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

二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消除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消除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有赖于从根本上改变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的局面。党中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是为了促进新时代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1]。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于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立足于缩小不同区域之间在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有关扶持机制,帮助欠发达地区补齐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短板,确保欠发达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建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完善区域治理体系、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更加有效,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保障”^[25]。到那时,我国将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并将从根本上消除目前不同区域之间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消除行业或产业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特别是消除我国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对不平衡发展内含的不平等的加剧。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供给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去虚向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有效消除目前我国行业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含的不平等。

正如前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发展不充分,要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充分发展,最为重要的是要适应当今世界潮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已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6]。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27]。该纲要还明确提出,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其中,“双轮驱动”就是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驱动发展,“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的粗放式增长向质量

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向创新要素主导转变,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但以“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按照《纲要》确立的战略目标,到 21 世纪中叶,我国将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到那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情况将彻底改观,并将从根本上消除目前我国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及其内含的不平等。

四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努力实现人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点阐述的内容之一,它要求我们按照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使人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得到真正实现。实现权利平等,首先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28](P90),切实“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9]。实现权利平等,也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习近平指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17](P135)。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平等权利。实现权利平等,还须改革和创新社会体制机制。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30](P94)。实现机会平等,最为重要的是消除制约人民平等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出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使“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29]。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央视网新闻频道, 2017-10-27.[2019-09-30].<http://news.cctv.com/2017/10/27/ARTIw3x1nOMEAmnaiR1zWuUII71027.shtml>.
- [2] 冯国权,刘军民. 正圆中国梦.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 [3] 霍布斯. 利维坦. 黎思复,黎廷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4]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5]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吕卓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 [6] 李瑜青. 卢梭经典文存.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 [7] 阿德勒. 六大观念——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 陈珠泉,杨建国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 [8]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9]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0] 秦彦士. 墨子考论. 成都:巴蜀书社,2002.
- [11] 章人英. 华夏文明圣火薪传.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 [12] 朱日耀. 中国政治思想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 [13] 康有为. 大同书.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8] 曹文炼,方正.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 中国产经, 2018,(2).
- [19] 黄锐. 中国 10 亿美元级隐形富豪约 750 人. 新京报, 2013-03-01.
- [20] 福布斯 2019 全球富豪榜. 排行榜 123 网, 2019-09-07.[2019-09-11]<https://www.phb123.com/renwu/fuhao/shishi.html>.
- [21] 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姚大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22] 崔常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
- [23] 罗荣渠. 现代化: 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2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 2018-02-05.[2019-09-30]http://www.moa.gov.cn/ztl/yhwj2018/spbd/201802/t20180205_6136480.htm.
-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8-11-29.[2019-09-30]http://www.gov.cn/zhengce/2018-11/29/content_5344537.htm.
- [26]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国文明网, 2012-11-19.[2019-09-30]http://www.wenming.cn/ziliao/zhongyaolunshu/hujintao/201211/t20121119_940190.shtml.
- [27]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6-05-19.[2019-10-14].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19/content_5074812.htm.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 [29]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网, 2013-03-18.[2019-09-30]<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8/c40531-20819774.html>.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An Analysis of the Equality Problem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New Era

Xu Zh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quirement of 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n New Era. However,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 essence of equality in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lies in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qual demand of the people and the inequality of the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our society. To resolve and overcome this contradiction effectively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hich can be don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e can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so as 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Second, we can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ird, we should deep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inequality caused by inadequ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ourth, we will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the people ar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strive to ensure equal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New Era; equality issue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equality

■ 收稿日期 2019-08-20

■ 作者简介 徐 珍, 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北京 10087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